

教派主义与叙利亚危机教派化机制浅析

李海鹏

摘 要：关于教派因素在叙利亚危机中作用的现有研究多持工具论观点，忽视了教派身份认同被精英工具化的必要条件以及教派动员的微观机制。本文认为，教派因素确非叙利亚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但阿萨德家族统治时期叙利亚社会长期积累的教派间利益分流、社会区隔和敌对情绪，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危机教派化的前提条件和大众动员的最初框架。2011年叙利亚危机爆发伊始，民间自发的地方性教派动员和暴力已然出现。叙国内外精英通过不同政策迅速直接或间接介入民间自发性的教派动员，制造或强化了历史积累和新近出现的教派敌意、利益冲突、能力、机会等因素，触发并加剧了“安全困境/暴力螺旋”和“群体内—群体间交互作用”两大机制，最终导致了危机的教派化。

关键词：教派主义；叙利亚危机；教派化；“双轨制”治理模式

作者简介：李海鹏，博士，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阿拉伯语系助理教授（北京 100871）。

文章编号：1673-5161(2021)01-0003-20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自 2011 年 3 月叙利亚危机爆发以来,国内外学界、政策届、媒体围绕教派因素对危机爆发及其走势的影响众说纷纭。在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中,少数学者持原生论的观点,将教派矛盾界定为叙利亚动乱爆发的本质或根本因素^①,更多学者或将之视为国家行为体进行地缘政治博弈的工具^②,或强调国族认同建构失败是叙利亚危机爆发的深层原因^③。在西方学界关于叙利亚案例的研究中,同样存在原生论、工具论、建构论三种倾向,但在内战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聚焦于冲突教派化的原因,关注教派化的长期结构性原因、教派主义动员的机会与环境以及精英的策略性行为。在媒体领域,叙利亚政府、反对派及各自支持者之间的论战,恰恰从不同角度印证了工具论者的论点:政府派坚称叙利亚危机是极端伊斯兰主义者和某些国外势力合谋,试图摧毁叙社会机体的阴谋;反对派则强调叙政府“分而治之”的政策是民众自发的、跨教派的和平抗议运动转变为教派性质暴力的首要甚至唯一原因。

上述工具论的论点尽管逐渐成为主流,但也存在一些明显的问题。它既没有说明教派身份认同能够被动员、政治化、工具化所需的特定条件,也未能揭示教派精英策略发挥效力的微观机制,同时默认了各教派民众仅仅是精英动员被动的接受者。本文试图重新检视教派因素在叙利亚危机爆发中的作用,考察危机迅速教派化的条件和微观机制。在对教派化机制的分析中,本文借鉴了双边族群动员的微观动力理论,以及唐世平关于族群战争爆发“四个关键因素+两大直接驱动力”的分析框架。前者强调族群内和跨族群的精英与民众间互动,尤其是族群内既有社会网络和族群间交往纽带的强弱对于民众回应本族群精英动员的影响。后者将具体因素驱动下的四大关键诱因(情绪、利益、机会、能力),作用于安全困境/螺旋模型和群体间—群体内互动两大动态机制,作为分析族群战争

① 李国富:《大国博弈下的叙利亚局势》,载《求是》2012 年第 15 期,第 55-57 页;殷罡:《叙利亚危机何以峰回路转》,载《中国报道》2013 年总第 116 期,第 40-41 页。

② 唐志超:《叙利亚战争与大国的地缘政治博弈》,载《当代世界》2018 年第 11 期,第 51-55 页。

③ 姚大学、闫伟:《叙利亚危机的根源及未来政治生态》,载《西亚非洲》2012 年第 6 期,第 4-22 页;韩志斌、闫伟:《从国家构建缺陷到国际体系变迁:叙利亚危机的深层逻辑及其前景》,载《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4 年 5 月(下),第 66-73 页;王新刚、马帅:《哈菲兹·阿萨德时期叙利亚政治体制解析》,载《西亚非洲》2015 年第 5 期,第 65-80 页。

爆发的广义框架。^①通过借鉴两套分析框架的核心思想,本文将情绪、利益等关键诱因置于历史制度分析的视角之下,旨在厘清学界、政策届和媒体关于叙利亚危机“教派性质”的争论,深化对叙危机根源及变化趋势的研判,并就危机解决、去教派化和战后重建的前景提供理论反思。

一、哈菲兹·阿萨德时期“双轨制”治理模式的形成

哈菲兹·阿萨德统治时期(1970~2000年)奠定了一种“双轨制”的社会治理模式:一方面是基于制度化的组织机构所构建起的跨教派、跨地域、跨阶层社会支持基础,另一方面则是基于家族、社区、部落、教派等纽带的非制度化庇护网络。两条线索前明后暗,或分或合而又彼此补充,体现在叙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中的各个领域,深刻塑造了叙国内不同教派间的利益关系、互动模式与相互认知。

(一) 权力结构中的教派特权与利益分流

在权力巩固过程中,阿萨德构建了一套包含军事—安全机构、复兴党及其附属民众性组织、行政官僚机构,从中央延伸至地方乃至基层的等级制权力结构,而基于家族、部落、教派纽带的庇护网络则以不同的方式贯穿于整个权力结构之中。在军事安全部门,阿萨德所依靠的与其说是军官群体中正式的等级制结构,不如说是一个基于个人信任之上的、非正式的松散庇护网络。这种个人信任很大程度上建立于与总统家族、部落、教派之间纽带的基础之上,其自然结果就是阿萨德家族、其所在部落和阿拉维派军官对叙重要军事和安全—情报部门的全面控制。更重要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前期和90年代中后期两次权力结构调整中,阿萨德对其亲族和教派庇护网络的依赖明显加强,逊尼派军官在军事安全机构高层中的影响力进一步弱化。总统的家族、教派亲信对军事安全部门的严密把持及其相关活动,为叙国内教派关系的持续紧张埋下了多重隐患。

首先,与阿拉维派军官相比,逊尼派中低层军官普遍表示因教派身份原因而在军官招募、任职、晋升、待遇以及对个人生活方式的尊重方面受到了不公正的

^① Sherrill Stroschein, “Microdynamics of Bilateral Ethnic Mobilization,” *Ethnopolitics*, Vol. 10, No. 1, 2011, pp. 1-9; Sherrill Stroschein, “Ethnic Conflict: Looking Inside Groups,” *Ethnopolitics*, Vol. 16, No. 1, 2017, pp. 74-76; 唐世平:《族群战争的爆发:一个广义理论》,载《国际安全研究》2018年第4期,第64-100页。

对待。^①这也为军事安全机构内部的精英分裂埋下了伏笔,其表现之一就是 2012 年以来政府军逊尼派军官的“叛逃”现象。其次,叙军事安全部门广泛且复杂地涉足经济领域,高层军官可通过充当私人资本的庇护者而谋取租金,其子女则越来越多地直接投身商界,中低层军官则可参与走私、索贿等非法经济活动。考虑到阿拉维派被广泛认为在军事—安全部门就业中享有优势,其他教派民众普遍将相关腐败或特权行为与阿拉维派联系在一起。^②最后,由阿拉维派主导的安全情报机构长期被视为国家暴力和不公正的最重要象征,也成为广大民众尤其是逊尼派恐惧、愤恨乃至仇视的主要对象,逊尼派针对 1982 年哈马事件的暴力复仇仍是很多阿拉维派和其他少数教派民众心中挥之不去的魔魇。^③

与军事安全部门相比,叙复兴党组织机构和政府行政机构在教派构成方面则更加多元。尽管不同于黎巴嫩的教派分权政体,重要教派群体在叙利亚复兴党、议会、行政机构高层中也维持着一定比例的默认席位,如德鲁兹派在叙复兴党地区中央中一直占据 1/21 个职位,基本锁定 2 个内阁席位,其所聚居的苏伟达省在叙议会中占据约 6 个议席。^④值得注意的是,阿萨德统治时期,逊尼派在复兴党叙利亚地区中央、政府内阁中所占比重明显增加,复兴党基层党员规模迅速扩大,党员年龄、性别、职业构成更加多元化,官僚机构也更加臃肿。究其原因,这一变化趋势恰恰反映出复兴党、行政机构在叙利亚权力结构中的位置和功能的变化。阿萨德执政时期,叙利亚权力分布逐渐由显性、制度化向隐性、低/非制度化面向转移,复兴党和官僚机构的功能则由社会动员转向精英吸纳、政策执行和社会控制。逊尼派在党内和官僚机构内比重的上升并不意味着权力平衡的实质性变化,而是更多反映出阿萨德政权与城市逊尼派合作、向私营部门示好的策略。^⑤

对教派因素的考虑同样体现在省级、市县级乃至基层的人事安排与治理之

① Hicham Bou Nassif, “‘Second Class’: The Grievances of Sunni Officers in the Syrian Armed Forces,”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Vol. 38, No. 5, 2015, p. 633.

② Heiko Wimmen, “The Sectarianization of the Syrian War,” in Frederic Wehrey, ed., *Beyond Sunni and Shia: The Roots of Sectarianism in a Changing Middle East*,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 67.

③ Ibid., p. 77; [叙利亚]里德旺·齐亚代:《恐惧年代:叙利亚强制消失者议题的正义与真相》(阿拉伯文),华盛顿:自由之家 2010 年版,第 73-84 页。

④ Birgit Schaebler, “Constructing and Identity Between Arabism and Islam: The Druzes in Syria,” *The Muslim World*, Vol. 103, Issue 1, 2013, p. 69.

⑤ Hanna Batatu, *Syria's Peasantry, the Descendants of its Lesser Rural Notables, and Their Politics*,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244-246.

中。在大马士革之外,各省份实际由安全情报机构控制——各省安全委员会由省长、省委书记、省安全机构主管组成,安全主管绝大多数为阿拉维派军官,官方职位较前二者为低,但却掌握最大的权力。而自 20 世纪 80 年起,阿拉维派省长数量就占据着省长职位的约 1/3,1990 年叙全国 14 位省长中有 5 位来自阿拉维派。^① 在地方和基层社会的治理中,阿萨德则着重倚赖地区传统领袖家族和宗教领袖的权威,这一点在少数教派聚居地区尤为明显。在阿拉维派占人口主体的拉塔基亚、塔尔图斯两省和德鲁兹派聚居的苏伟达省,阿萨德政府在行政区划及其变更中就充分考虑到地方社会组织结构和传统领袖家族等因素。^② 在教派混居的沿海省份,新增置县级和乡镇级政府向阿拉维派村镇的明显倾斜,也不可避免地会在逊尼派聚居村镇中引发不满。

(二) 公共和私营经济部门的教派利益分流

在经济领域,阿萨德政府一方面通过公共部门内相对稳定的工作、复兴党庇护网络、基本消费品补贴和社会服务,完成对城市和农村地区中产—中低收入阶层的吸纳,另一方面则通过非正式的政商网络实现了对城市私营中上收入阶层和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控制。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阿萨德政府总体上兼顾了全国各地、城乡之间的经济协调发展,但个别省份和地区仍存在指责政府基于教派因素考虑而有意忽视本地区发展的不满呼声。^③ 更严重的不满声音主要指向国有企业就业中的教派优待/歧视现象。阿萨德时期,作为政府政治吸纳和解决就业问题的重要杠杆,包括国营企业在内的叙公共部门规模迅速扩大。1974 年至 1985 年叙国有工业部门扩张时期,大马士革、东北部地区(拉卡、代尔祖尔、哈塞克)和沿海省份成为国有部门扩张的主要受益者。沿海省份的显著受益也折射出叙政府试图利用国有企业就业机会,扩大在阿拉维派社群及其聚居地区庇护网络的考量。这种优待政策在经济衰退时期体现得更为明显。1985 年至 1996 年随着叙利亚陷入经济衰退,叙国有企业招募实际处于冻结状态,沿海地区却成为同期叙国内唯一一个国有工业企业雇员数量继续增长的地区。至 1994 年,沿

^① Alain Chouet, “L’espace tribal alaouite à l’épreuve du pouvoir: la désintégration par le politique,” *Maghreb-Machrek*, No. 147, 1995, pp. 93-119.

^② Fabrice Balanche, *La région alaouite et le pouvoir syrien*, Paris: Karthala, 2006, pp. 40-41, 154-155; Cyril Roussel, “L’interface des grandes familles druzes entre local et national,” *Revue des Mondes Musulmans et de la Méditerranée*, n° 115-116, Aix-en-Provence, pp. 135-153; Cyril Roussel, *Les Druzes de Syrie: territoire et mobilité*, Beyrouth: Presses de l’Ifpo, 2011, p. 59.

^③ Alasdair Drysdale, “The Regional Equalization of Health Care and Education in Syria Since the Ba ‘ thi Revolu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Vol. 13, No. 1, 1981, pp. 93-111; Fabrice Balanche, *La région alaouite et le pouvoir syrien*, pp. 57-60, 109.

海地区已集中了叙国有工业企业雇员总数的近 20%，而该地区占全国人口比重不超过 10%。与之相比，逊尼派占人口主体的叙北部地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 27%，但该地区仅占全国国有工业企业雇员总数的 15% 左右。^① 作为叙沿海省份中的主体人口，阿拉维派也自然成为该地区国有企业就业的最大受益群体。考虑到国内的高失业率以及国有企业工作隐含的诸多优势和福利，国有经济部门中阿拉维派所享受的优待几乎必然激起其他教派群体的不满和怨恨。2011 年危机爆发之初，巴尼亚斯、拉塔基亚、塔尔图斯等城市教派混居区示威者要求纠正国有企业和行政机构雇佣中的偏向阿拉维派的政策，集中反映出上述教派优待政策对教派间关系产生的长期消极影响。^②

私营经济部门中的教派参与和利益分布状况则与公共经济部门形成强烈反差。在叙利亚城镇私营部门的中下层，逊尼派和基督徒长期占据着主导地位，其在资本、技术知识、管理经验以及地理位置等方面的优势很难在短期内被后来者超越。此外，鉴于家族性的小型企业在叙私营经济部门中占绝对主导地位，在社会信任度偏低且竞争激烈的大背景下，核心家庭、家族、社区、教派自然成为组织经济活动的主要框架，少数教派在代理、采购、营销、就业等环节很难融入其他教派的经济网络。^③ 其结果是，在私营部门中下层，逊尼派和各少数教派各自形成了相对封闭性的城市经济网络，少数教派成员整体处于边缘地位。在阿拉维派占人口主体的拉塔基亚市，阿拉维派小手工业主、批发商和店主在批发、营销、零售等环节始终难以融入逊尼派商人主导的全国性贸易网络。^④ 同样，在德鲁兹派聚居的苏伟达省，来自大马士革、德拉甚至阿勒颇、约旦的逊尼派批发商实际控制着德鲁兹派农产品的收购、大部分储存设备以及国内外零售市场。为获得贸易或就业机会，部分德鲁兹人在经济活动中不得不隐瞒自己的地域、教派身份。^⑤ 如果说叙利亚政府在国有经济部门潜在的教派优待政策直接造就了一个严重依赖政权租金、缺乏经济独立性且受到人口主体敌视的阿拉维派庇护网络的话，那么私营部门封闭的教派经济网络一方面是传统经济生态的延续，另

① Fabrice Balanche, *La région alaouite et le pouvoir syrien*, pp. 120-122.

② Heiko Wimmen, "The Sectarianization of the Syrian War," p. 66.

③ Bassam Haddad, *Business Networks in Syria: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uthoritarian Resilience*,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81.

④ Fabrice Balanche, *La région alaouite et le pouvoir syrien*, pp. 213-215.

⑤ Cyril Roussel, "L'agriculture dans la montagne druze (Syrie) entre clientélisme, blocages communautaires et libéralisation économique: un développement durable pour le paysan druze?," *Géocarrefour*, Vol. 83, No. 3, 2008, pp. 217-219.

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因教派间政治、经济竞争和潜在敌意而进一步固化。这种公私经济领域的利益分流和情感隔阂也将在巴沙尔·阿萨德经济改革时期进一步尖锐化。

（三）温和且平衡的社会及文化政策与教派间社会区隔

在文化和社会领域,阿萨德政府尽管仍维持着世俗主义的意识形态表象,但基本放弃了积极的整合性国族建构政策。究其原因,1982年哈马事件后,穆兄会势力基本被清除出叙利亚,叙逊尼派人口中出现领导层真空,而阿萨德政府在逊尼派民众中支持度也遭遇致命打击,与该群体间缺乏有力的联系纽带。面对这一困境,叙政府在延续教育、媒体领域温和的伊斯兰政策的同时,开始通过精英吸纳途径加强政府对伊斯兰宗教领域的管控,在意识形态、公共空间内宗教性的表达等方面进一步向宗教集团做出让步。在宗教教育、媒体宣传方面,阿萨德政府一方面有意将宗教认同与爱国主义、阿拉伯民族主义情感结合起来,传达某种温和、包容的宗教观念;另一方面却强行灌输一套具有高度统合性的逊尼派伊斯兰观念,在塑造并推广一套多元社群“和谐共处、相互尊重、珍视多元性”的官方叙事的同时,有意压制公共空间内关于教派间信仰、实践差异的任何表达。在宗教机构的管理方面,阿萨德政府加大了对伊斯兰宗教机构的资助和支持,并给予伊斯兰宗教人士更大的媒体、出版空间与自由度。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叙政府批准新建了约8,000座清真寺、20多所伊斯兰高等教育机构和约600所半官方的宗教机构,甚至捐赠国有土地用于修建新的宗教建筑或清真寺。^①在宗教团体的管控方面,阿萨德政府成功吸纳了一批亲政府的制度化苏非教团、传统建制派伊斯兰学者以及非政治化的伊斯兰社会运动组织,很大程度上塑造了逊尼派宗教团体内部的力量平衡,从而间接实现了对逊尼派社会基层的有效管控。客观来看,上述政策在短期内可能迎合了占人口主体的逊尼派的宗教情感和伦理观念,但长期来看却无助于改善各宗教社群间的认知偏差、偏见乃至敌意。在特定语境下,长期被压制的教派间敌意就可能被教派精英、政治团体乃至国家行为体作为政治动员的工具加以利用。

在社会基层,各教派、族裔在日常生活中的交往却与官方意识形态的描述不尽一致,这集中体现在教派族裔的居住格局、族际通婚等方面。一方面,哈菲兹·阿萨德执政以来,叙利亚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加速,但这一进程并未从根本上撼动“大集中、小分区、少混居”的教派居住格局。很多来自边缘地区、具有少

^① Line Khatib, *Islamic Revivalism in Syria: The Rise and Fall of Ba' thist Secularis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1, pp. 90-91.

数族裔身份的农村移民群体进入大马士革、阿勒颇、霍姆斯、拉塔基亚等叙主要城市地区,但他们并没有与城市常住人口实现自然融合,而是根据教派、地域纽带在城市边缘地区形成新的独立社区。以霍姆斯为代表的新兴工业城市中阿拉维派人口比重激增,甚至出现少数教派混居街区。资源竞争意识及生活方式方面的差异,都增强了逊尼派“常住居民”的不安全感,这种城市化造成的新旧居民矛盾也将在危机时刻爆发为激烈的教派暴力。另一方面,内婚制的婚姻实践则是维系不同教派、族裔间严格边界的另一核心机制。考虑到婚姻、家庭生活在各宗教社群伦理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以及少数教派对同化和宗教知识流失的敏感性,叙各宗教群体仍遵循着非常严格的教派内婚制,叙政府的相关立法也强化了各宗教社群在个人身份事宜领域的自主权。可以说,复兴党统治时期叙利亚不断加速的城市化、工业化进程,带来的并非不同社会群体的融合,反而使城市乃至村落居住空间呈现教派化、碎片化。这种真实的教派、族裔界限不仅构成了社群间相互认知的基本框架,也将为内战初期的教派动员和集体暴力提供现成的组织网络。

二、巴沙尔·阿萨德时期“双轨制”治理模式的蜕变

哈菲兹·阿萨德执政末期至巴沙尔·阿萨德执政前十年,叙利亚经历了权力结构调整和经济自由化改革深化的双重转型。哈菲兹·阿萨德所奠定的跨教派、跨地域、跨阶层社会支持基础由此出现收缩、松动和利益重组的趋势,个人、亲族、教派化的庇护网络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作为转型时期复杂社会矛盾的一个副产品,各教派民众对教派间利益矛盾的认知和敌对情绪加剧,为 2011 年叙利亚危机的迅速教派化埋下了伏笔。

(一) 政权权力核心的家族化、去逊尼派化

1994 年哈菲兹·阿萨德在长子巴西勒·阿萨德意外去世之后,开始为次子巴沙尔的权力交接作出部署,削弱军队、安全情报机构以及复兴党领导层内对巴沙尔继任构成阻力的“元老派”势力。2000 年继任后,以巴沙尔为首的改革派集团和残存的元老派精英之间的权力斗争继续展开,军事安全部门和复兴党党组织机构仍然是两集团争夺的焦点。在军队和安全情报部门,巴沙尔继续利用军人强制退休年龄等手段对重要军事职位进行人士调整,至 2005 年巴沙尔已经完成了对军队和安全情报机构高层的大规模洗牌。这一波大规模人士调整,进一步

强化了阿拉维派军官在军队、安全机构高层中的主导地位。^① 新总统所任命的年轻一代军官常常被视为“腐败而无能”，不像老一辈的军官“尽管高度腐败，但具有真正的经验和权威，能得到其部下的尊重”。^② 为强化对军队控制而开展的反腐运动撼动了整个军队内部的庇护网络。更重要的是，巴沙尔在安全事务方面表现出越来越依赖其家族近亲成员的倾向，特别是其胞弟马希尔·阿萨德、姐夫阿绥夫·肖凯特的重要性迅速上升。可以说，2011年叙利亚危机前夕，其他教派精英和民众对叙军事安全部门的教派化、家族化认知进一步强化，而军事安全部门内部不同教派、不同代际军官之间的裂痕也在不断加深。

复兴党党组机构是以总统为首的改革派和以复兴党地区中央为主要依托的“元老派”争夺的另一重要领域。2003年伊拉克萨达姆政权被推翻后，巴沙尔开始全面削弱复兴党在政府、议会、军队乃至媒体中的影响和存在，通过针对性的改革措施有意削弱复兴党的庇护网络及其意识形态垄断地位。^③ 2005年6月召开的复兴党“地区十大”则标志着元老派的最终失势。与军事安全部门的洗牌不同，巴沙尔对复兴党党组机构职能和影响力的削弱严重动摇了哈菲兹·阿萨德所建立的旧有权力格局。一方面，复兴党及其附属机构的削弱，严重破坏了叙利亚政权正式、制度化的国家治理机器，强化了巴沙尔政权统治的家族化、个人网络化色彩。另一方面，随着复兴党组织和权限的削弱、掌控资源的萎缩，叙政府向城市和农村社会基层渗透、扶植吸纳支持者的能力也大打折扣。特别是“元老派”逊尼派精英的边缘化，导致其支撑的逊尼派庇护网络失去根基，因而无论在权力核心还是基层都造成了逊尼派受到打压、阿拉维派在权力结构中垄断地位进一步提升的印象。^④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加剧教派间利益冲突

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哈菲兹·阿萨德开始逐步推进经济自由化改革。巴沙尔执政特别是2005年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叙经济改革显著加速，开始

^① Hicham Bou Nassif, “‘Second Class’: The Grievances of Sunni Officers in the Syrian Armed Forces,” pp. 646–649.

^②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Popular Protest in North Africa and the Middle East (VI): The Syrian People’s Slow Motion Revolution,” *Middle East/North Africa Report*, No. 108, 2011, pp. 27–28.

^③ David W. Lesch, *The New Lion of Damascus: Bashar al-Asad and Modern Syria*,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219; Volker Perthe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yria under Asad*, London and New York: I. B. Tauris, 1995, pp. 10, 21.

^④ Raymond Hinnebusch, “Sectarianism and Governance in Syria,” *Studies in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 Vol. 19, No. 1, 2019, p. 53.

触及到政府补贴、国企改革、金融税制改革、投资优惠政策等诸多敏感领域。然而,新的改革措施在成功打破既有利益分肥模式的同时,极大地动摇了老阿萨德时期奠定、随着经济长期停滞已然摇摇欲坠的跨教派社会联盟基础,对不同社会群体产生了不均衡的影响,最终间接触碰到教派间关系的敏感神经。

巴沙尔时期,叙利亚经济改革的最主要受益者是一个与权力核心有密切关系的新权贵资本集团。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至 90 年代末,随着叙国内经济自由化改革的启动和推进,一个由核心权力精英、军队及安全机构精英、行政机构精英、公共经济部门主管及其子女组成的权贵资产阶级逐渐成形,并开始涉足核心经济领域。^① 考虑到阿拉维派在权力结构上层的优势地位,这一权贵资本集团不可避免地带有教派色彩。2000 年至 2005 年巴沙尔逐步完成政权巩固后,开始着手替代商界中那些与元老派关系密切的人物,旧有政商网络经历大规模洗牌,国家资本集团中旧有或新崛起的效忠派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了更多的部门和更大的比重,其中的代表人物即巴沙尔的表弟拉米·马赫鲁夫(Rāmī Makhlūf)以及远亲穆罕默德·哈姆舒(Muhammad Hamshū)。^② 叙私营经济部门上层的利益分流情况非但没有改观,反而更加集中、垄断,向带有更明显教派乃至家族色彩的一小撮权贵资本家的方向偏移,以马赫鲁夫为代表的新权贵资本集团严重挤压了原有的逊尼派亲政府商人集团的利益。鉴于其庞大的商业帝国和炫富的生活方式,马赫鲁夫本人及其财富更被视为政权贪婪、腐败、不公正的象征,叙利亚危机初期即成为示威者攻击的对象,在激发逊尼派民众对阿拉维派愤恨方面扮演了关键角色。^③

农民、城市劳工、公共部门雇员等传统上支持政权的群体,则很难称得上是巴沙尔“社会经济改革”的受益者。2004 年以来,叙政府经济改革的触角开始深入农业部门,大幅度削减农业相关补贴,在土地产权方面明显向资本集团倾斜,同时将农村地区发展、保护弱势群体的职能转移给非政府部门。相关政策在短期内对叙农村社会造成了巨大冲击,而逊尼派占人口主体的叙北部、东北部省份

① Bassam Haddad, *Business Networks in Syria*, pp. 67–69.

② Caroline Donati, *L'exception syrienne: entre modernisation et résistance*, Paris: Découverte, 2009, pp. 231–232, 235–237; Volker Perthes, *Syria under Bashar al-Asad*, pp. 37–38.

③ 关于叙利亚危机初期示威民众攻击马赫鲁夫财产的案例,参见[叙利亚]穆罕默德·哲马勒·巴鲁特:《叙利亚历史的最近十年:僵化与改革的辩证法》(阿拉伯文),贝鲁特:阿拉伯学术与政策研究中心 2012 年版,第 187、191 页;[叙利亚]奈鲁兹·萨提克:《叙利亚起义中的教派主义状况:路径和模式》(阿拉伯文),载[叙利亚]阿扎德·艾哈迈德·阿里等主编:《革命的背景:叙利亚研究》(阿拉伯文),贝鲁特:阿拉伯学术与政策研究中心 2013 年版,第 400 页;Raymond Hinnebusch, “Sectarianism and Governance in Syria,” p. 54.

棉农和农业工人则成为上述政策的最主要受害者。2007年至2010年旱情期间,大量来自东北部省份的逊尼派农民迁移至城市边缘地区寻找就业机会,对本就脆弱的城市经济生态构成了额外压力。^①包括官僚机构和国有企业在内的公共部门职员同样受到这一时期经济改革的强烈冲击。更危险的是,在失业率高企的大背景下,叙政府采取了冻结公共部门雇佣的政策。这一政策直接动摇了联系叙政府与城市中产阶级、特别是受过高等教育的逊尼派青年群体之间最重要的纽带,早在2011年危机爆发之前就已引发了严重的社会抗议事件。随着公共部门职位的竞争日趋激烈,其他教派民众对于阿拉维派在公共部门所享受“教派优待”的不满情绪也骤然上升。与公共部门职员相比,城市私营部门中下层民众的经济地位更加脆弱,在这一时期成为失业、贫困问题的主要受害群体。考虑到政府对社会福利支出的削减,越来越多的私营部门青年人口开始依赖家族、社区经济网络来解决生计问题,从而进一步强化了逊尼派和各少数教派已有的封闭性城市经济网络。对于少数诉诸公开抗争的城市下层民众而言,带有家族和教派色彩的权贵资本集团则成为其发泄不满和愤怒的重要对象。

(三) 短视、失衡、工具化的宗教政策导致宗教治理紊乱

与哈菲兹·阿萨德时期相对温和、平衡的宗教政策不同,巴沙尔政府出于国内外的政治经济压力开始推行一种短视、失衡、工具化的伊斯兰宗教政策,最终导致政府对逊尼派宗教网络控制力松动、极端伊斯兰主义思想和团体增殖,教派间潜伏已久的紧张关系也因而加剧。

首先,在教育、媒体、公共空间内的宗教表达等方面,为在国内争取尽可能广泛的社会政治力量的支持,巴沙尔不惜利用各种方式向占人口主体的逊尼派释放善意,取消了作为复兴党在高校思政教育支柱的“民族文化”课程,加大对国内清真寺、伊斯兰教育与慈善机构的支持力度,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则越来越公开地利用伊斯兰宗教话语来服务于外交政策。^②这些带有强烈伊斯兰色彩的官方话语和公共政策可能在短期内有助于凝聚逊尼派民众对巴沙尔政府内外政策的支持,但却破坏了哈菲兹·阿萨德在政府的世俗主义取向与社会人口主体的伊斯兰认同之间所搭建的脆弱平衡,无助于从根本上解决阿萨德政权的合法性困境。

其次,在对国内伊斯兰团体的管控方面,巴沙尔开始尝试对亲政府的逊尼派

^① World Bank, *Syria-Agriculture in Syria: Towards the Social Market*, Washington, D. C. : World Bank, 2008, pp. 51, 53-54.

^② David W. Lesch, *The New Lion of Damascus*, pp. 207-208; Charles R. Lister, *The Syrian Jihad: Al-Qaeda, the Islamic State and the Evolution of an Insurgency*,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 34; Line Khatib, *Islamic Revivalism in Syria*, pp. 137-138.

宗教网络进行重组,在大马士革、阿勒颇等地区转向其父亲执政时期长期被边缘化的宗教学者集团。考虑到其新合作伙伴在组织动员能力方面的局限性,上述政策在经济改革造成社会动荡的关键时期却削弱了叙政府与逊尼派基层社会间的制度化纽带。^① 将部分国家社会服务职能转移给亲政府的宗教慈善机构的策略也明显具有短视性。考虑到逊尼派机构在宗教慈善领域占据主导地位,且相关机构主要依托于社区、宗教—族裔社群、教堂或清真寺的纽带,上述做法显然增强了宗教机构对宗教保守人口的影响力及其相对于政府的独立性,强化了各社区、教派内部封闭的自助性庇护网络。^②

最后,更为危险的是,巴沙尔政府策略性地利用激进伊斯兰主义团体。2003年后,为制衡美国的外交和军事威胁,叙军事情报机构开始与前伊拉克复兴党成员、“基地”组织建立策略性合作关系,为后者在叙境内招募、训练、输送外国和本国“圣战”分子进入伊拉克提供便利。这一危险的策略最终引发了多重严重后果:2007年底开始,极端伊斯兰主义团体开始向叙境内目标发动袭击,叙国内安全局势明显趋于紧张;有跨国“圣战”经验的极端伊斯兰主义团体开始在叙境内进行招募,来自农村或城市边缘地区的青年贫困群体成为其主要招募对象;这些圣战萨拉菲主义团体又进一步推动了反什叶派、反阿拉维派的定叛思潮在叙国内的传播,从而激化了叙国内的教派矛盾话语。^③ 意识到上述种种政策的真实或潜在风险,2008年下半年起巴沙尔政府出台一系列措施,开始限制国内宗教团体的活动空间,加大对宗教学者集团的吸纳力度,同时压制伊斯兰思潮在社会生活各层面的影响,但结果也造成政府与逊尼派保守人口之间关系急转直下。而巴沙尔冒进宗教政策对教派间关系的种种影响,在叙利亚危机爆发后也暴露无遗。

三、叙利亚危机教派化的因素和机制

1970年至2010年,哈菲兹·阿萨德所奠定的“双轨制”社会治理模式及其退化,为叙利亚国家—社会关系以及社会各群体间的关系留下了复杂的遗产。首

^① Thomas Pierret, *Religion and State in Syria: The Sunni Ulama from Coup to Revolution*,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87-88, 93-95.

^② Thomas Pierret and Kjetil Selvik, “Limits of ‘Authoritarian Upgrading’ in Syria: Private Welfare, Islamic Charities, and the Rise of the Zayd Movemen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Vol. 41, No. 4, 2009, p. 159; Line Khatib, *Islamic Revivalism in Syria*, pp. 137-138.

^③ Charles R. Lister, *The Syrian Jihad*, pp. 33-45; Line Khatib, *Islamic Revivalism in Syria*, pp. 189, 193, 198.

先,各教派、族裔民众间因各种原因积累的不满、怨恨、恐惧、仇视长期潜伏,并有强化的迹象。其次,经济转型中的利益受损者在各个地域、阶层、教派中普遍存在,但关于少数教派特别是阿拉维派与统治集团利益密切绑定、自身利益却因之受损的认知,在逊尼派民众中却得到普遍认同。最后,反对派政党和公民社会组织长期遭受压制,民间潜在的组织动员力量大多依托于家族、街区、部落和教派等地方性网络。可见,从情感、利益和组织能力的角度来看,一旦政治秩序失控,叙国内民间力量在短期内很难组织起具有统一政治纲领、利益共识、组织结构的反对派力量,而爆发带有教派、族裔色彩的地方性骚乱的可能性却要大得多。在特定的政治机会背景下,国内外政治精英通过不同的动员策略,很可能会刺激或改变既有的情感、利益和能力因素,进而对对立群体间的互动模式产生影响。2011年叙利亚危机初始阶段的民众动员,正是沿着这一轨迹滑向教派暴力的渊薮。

(一) 相关方的危机应对策略及其影响

与处理国内社会运动的西方工业化国家不同,叙利亚政府面对2011年3月爆发的民众动员时立场并非中立,沙特、卡塔尔、土耳其、伊朗、真主党等地区国家或非国家行为体也迅速介入其中。上述政治行为体的应对策略,对叙国内民众动员的走向和结果产生了直接影响。

在示威活动爆发的最初几个月内,巴沙尔政府基本沿用了一套较为连贯的“平叛”策略,主要体现在话语宣传、组织动员、暴力压制等方面。首先,通过官方媒体对危机定性,凸显反对派“教派身份”和抗议活动的“阴谋”本质,散布反对派中部分逊尼派人士对少数教派敏感宗教议题的争议性言论,大肆报道带有明显教派色彩的绑架、谋杀和其他残忍暴行。其次,利用亲政府势力组织亲政府的示威活动,通过安全机构介入并通过安插间谍、策划绑架等手段制造教派对立,最终通过安全机构扶植建立亲政府的准军事组织。^①再次,不惜动用安全部队、亲政府准军事组织乃至常规部队对不同教派进行选择性的镇压——对逊尼派街区和目标进行有针对性的打击,对少数教派聚居地区的反对派抗议活动则有意避免使用致命暴力。最后,针对被捕反对派人士的特殊措施,包括拘捕、酷刑折磨世俗或温和反对派,选择性释放政治犯、在押的圣战萨拉菲主义者。^②客观来看,

^① Friederike Stolleis, ed., *Playing the Sectarian Card: Identities and Affiliations of Local Communities in Syria*, Beirut: Friedrich-Ebert-Stiftung, 2015, pp. 14, 97, 107.

^② Rania Abouzeid, “The Jihad Next Door,” *Politico Magazine*, June 23, 2014; Adam Baczko, Gilles Dorransoro, and Arthur Quesnay, *Civil War in Syria: Mobilization and Competing Social Orders*,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p. 88.

叙政府的上述政策通过不同因素的共同作用,最终推动了叙利亚危机的教派化。在情绪因素方面,叙政府的宣传话语成功激发了少数族裔对逊尼派伊斯兰主义者潜伏已久的恐惧,其动员措施在不同教派或混居社区中制造了敌对情绪,而选择性的暴力镇压则在逊尼派民众中引发了暴怒、仇恨和对少数教派的猜疑和愤恨;从能力的角度来看,政府对亲政府社区的武装强化了亲政府团体相对于反对派的组织动员和军事能力;释放圣战萨拉菲主义囚犯则为反对派的激进化创造了机会。

部分地区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的介入,以不同的方式对叙利亚危机和冲突的教派化产生了重要影响。2012 年初以来,沙特、卡塔尔、土耳其三国开始公然站在反对派一方介入叙利亚危机。截至 2013 年年底,其主要政策至少表现为:动员阿盟和国际社会对叙政府进行外交孤立、经济制裁,呼吁进行军事干涉;默许国内或定居本国的逊尼派保守宗教学者通过媒体和社交网络传播反什叶派、反真主党的观点;通过不同渠道向叙反对派不同武装派别提供资金、武器;为反对派不同政治和武装派别提供后勤、武器、人员流动、情报等方面的支持。^① 同期,支持叙政府的地区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同样采取多种方式回应叙利亚危机的挑战。一方面,2012 年伊朗和真主党就开始向叙政府提供武器和军事训练支持,帮助叙政府重整国内军事力量;另一方面,来自黎巴嫩、伊拉克和伊朗的多支什叶派民兵组织正式介入了叙利亚的军事冲突,真主党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于 2013 年 5 月正式承认真主党的军事介入。^② 与叙政府的政策类似,上述地区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的介入,同样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叙国内民众动员的走向和结果。从情绪诱因的角度来看,敌对政府及其代言人带有教派主义色彩的宣传加剧了少数族裔民众对示威目标和本质的疑惧,伊朗和真主党的军事介入则引发

^① Christopher Phillips, "Sectarianism and Conflict in Syria,"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36, No. 2, 2015, p. 370; Line Khatib, "Syria, Saudi Arabia, the U. A. E. and Qatar: The 'Sectarianization' of the Syrian Conflict and Undermining of Democratization in the Region," *British Journal of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46, No. 3, 2019, pp. 396-398; Christopher Phillips, *The Battle for Syria: International Rivalry in the New Middle East*,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6, pp. 135-142; Samer N. Abboud, *Syria*, Cambridge and Malden: Polity, 2016, pp. 121-124, 132-134.

^② Christopher Phillips, *The Battle for Syria*, pp. 149-150, 157, 161-163; Paulo G. H. Pinto, "The Shattered Nation: The Sectarianization of the Syrian Conflict," in Nader Hashemi and Danny Postel, ed., *Sectarianization: Mapping the New Politics of the Middle East*,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 140-141.

或加深了逊尼派民众对“什叶派—阿拉维派”联盟的仇视^①；在能力方面，不同外部势力的介入直接提升了反对派武装以及叙利亚政府及亲政府团体的组织动员和军事能力；从机会的角度来看，地区反叙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政策导致叙政府面临多方面困境和压力，自然地被反对派解读为推翻叙政府的良机。

（二）反对派群体动员机制与危机的教派化

叙利亚危机爆发之初，民间自发的跨教派和平示威一度成为反对派动员的主要形式，但长期积累的教派矛盾在自发或触发之下已然呈现出暴力化的趋势。在反对派缺乏有效的全国性组织架构、暴力不断升级、外部势力介入力度加大、国内不同群体立场分歧加剧的背景下，各方精英的危机应对策略加剧或触发了反对派与亲政府群体之间的安全困境/暴力螺旋，导致了反对派内部温和派和强硬派的此消彼长，并最终推动反对派在话语和组织层面的教派化。这一动员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11年3月至7月）叙利亚危机尚未完全军事化，自发、跨教派的和平抗议是该阶段民众动员的主要形式，但自发或触发的教派动员和暴力同样存在。很多记录表明，危机爆发初期很多少数教派、族裔群体成员积极参与了和平示威活动，绝大多数示威活动的口号、主题也带有明显的包容性和跨教派色彩。但即便是在危机初始阶段，世俗反对派所诉诸的话语和组织形式也具有某些内在的局限性。反对派中的逊尼派民众在示威活动中自发地使用了某些伊斯兰相关的符号或制度——如口号（“安拉至大”）、地点（清真寺）、抗议日期（聚礼日），尽管其本意可能并非要凸显特定的教派身份，但在很多持观望态度的少数教派民众中却引发了猜疑和恐惧。^② 示威活动的组织者多是城市背景的政治积极分子，而后来成为社会动员主要机制的“地方协调委员会”（*Lijān al-Tansiq al-Mahalliyyah*）本质上是基于家族、街区或村庄纽带的非正式组织，很难具备跨地域、跨教派动员的能力。^③ 更重要的是，自2011年4月中旬起，带有明显逊尼派宗教标记的示威活动和反阿拉维派暴力就已经出现。少数教派示威者因此身份而遭到其他示威者的驱逐，抗议活动中出现针对特定少数教派的攻击性口号，甚至在危机转变为武装冲突之前很久，就已出现了教派间绑架、暗杀等恶性暴力事

^① [叙利亚]奈鲁兹·萨提克：《叙利亚起义中的教派主义状况：路径和模式》（阿拉伯文），第396页；[叙利亚]穆罕默德·哲马勒·巴鲁特：《叙利亚历史的最近十年：僵化与改革的辩证法》（阿拉伯文），第186、191页。

^② Adam Bacsko, Gilles Dorronsoro and Arthur Quesnay, *Civil War in Syria*, p. 179; Friederike Stolleis, ed., *Playing the Sectarian Card*, pp. 21–22, 78.

^③ Samer N. Abboud, *Syria*, pp. 66–69.

件以及利用图片、视频宣传带有教派色彩的残忍暴行的案例。^① 考虑到上述事件多发生在霍姆斯、拉塔基亚等教派混居城市,此类自发性的教派暴力反映了长期积累的教派敌对情绪和现实利益冲突。可见,这一阶段叙利亚危机尚未教派化,世俗反对派的跨教派动员和地方性的教派动员同时存在,但暴力升级所触动的安全困境将平衡不可逆转地导向了后一种形式的动员。

第二阶段(2011 年 7 月至 2012 年 7 月)的特点是反派对组织加速军事化,动员话语加速教派化,安全困境/暴力螺旋成为冲突教派化的主要机制。2011 年 4 月起叙政府开始调动军队对反对派抗议活动进行弹压,至 2012 年 2 月炮击和轰炸已成为叙政府的常规军事手段。政府选择性暴力镇压所引发的恐惧与愤怒,在反对派群体中迅速触发了安全困境/暴力螺旋机制。而少数教派群体的整体沉默、部分亲政府团体对镇压的参与以及教派敌对与利益冲突的历史遗产,都自然导致反对派将政府镇压解读为针对逊尼派的行为,将少数教派视为叙政府的支持者乃至同谋者,其结果就是反对派的军事化及组织动员的教派化。2011 年 7 月成立的“叙利亚自由军”(al-Jaysh al-Sūrī al-Hurr)囊括了西方国家所支持的大部分世俗性武装团体,是反对派组织军事化的重要标志。但该组织本质上是高度地方化的武装团体所组成的松散联盟,其活动范围仅限于自身的村庄、城镇和城市,招募对象多来自农村中下阶层的逊尼派青年群体,且很多团体并不服从中央指挥机构的整体战略、包括吸纳少数民族的政策。^② 这些特点都决定了“叙利亚自由军”对少数族裔群体吸引力有限。随着 2012 年夏以来“叙利亚自由军”的加速衰落,叙少数族裔群体也失去了一个参与反对派活动的主要渠道。话语层面,随着暴力的升级,伊斯兰元素开始在反对派的宣传话语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部分反对派武装开始通过团体命名(“法鲁克营”“认主独一旅”)、旗帜(书写着清真言的黑旗)等方式策略性地凸显抗争行为的教派和“圣战”色彩。^③ 尽管反对派各武装团体在意识形态方面复杂多元,在使用各种话语、符号时考量各异,但上述带有逊尼派色彩的话语宣传无疑加深了不同社群间在日常

① [叙利亚]奈鲁兹·萨提克:《叙利亚起义中的教派主义状况:路径和模式》(阿拉伯文),第 402-404 页;[叙利亚]穆罕默德·哲马勒·巴鲁特:《叙利亚历史的最近十年:僵化与改革的辩证法》(阿拉伯文),第 232 页。

② Samer N. Abboud, *Syria*, pp. 88-91; Adam Baczko, Gilles Dorronsoro and Arthur Quesnay, *Civil War in Syria*, pp. 106-107.

③ Adam Baczko, Gilles Dorronsoro and Arthur Quesnay, *Civil War in Syria*, pp. 96, 179-181, 261-262.

交往中的不信任感和阿拉维派、基督徒等少数教派的恐惧和安全困境,^①也削弱了世俗主义反对派跨教派包容性话语的可信度,凸显了反对派构成的排他性和教派色彩。

第三阶段(2012年7月至2013年11月)标志着反对派组织彻底教派化。上一阶段的安全困境/暴力螺旋机制继续发挥效力,而在“叙利亚自由军”军事效率低下、组织纪律性弊端凸显、内部分裂日益严重的背景下,群体内—群体间交互作用成为推动反对派武装激进化、冲突教派化的另一重要机制。2012年夏以来,“沙姆自由人”“伊斯兰军”“认主独一旅”等原本独立或在“叙利亚自由军”中保持低调的武装团体,在反对派内部的资源竞争中迅速压倒了“叙利亚自由军”中的世俗武装团体,而这些武装团体的领导人很多恰恰来自叙政府前期有意释放的激进伊斯兰主义囚犯。^②考虑到部分海湾国家政府和公民更倾向于支持伊斯兰主义团体,这一类反对派武装开始竞相在宣传渠道(视频、社交网络平台等)中凸显“圣战”和反什叶派主题,改为运用伊斯兰传统宗教服饰、名称,并在其控制区内强制执行沙里亚法和相关社会规范。^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面对2013年8月化武危机的不作为,对其所支持的“叙利亚自由军”尤其是其中世俗派别的公信力则构成了致命打击。2013年11月,包括“沙姆自由人”“伊斯兰军”在内的叙利亚7支最强大的反对派武装团体联合组建“伊斯兰阵线”(al-Jabhat al-Islāmiyyah),成为叙国内最强大的反对派军事联盟。随着2013年以来“支持阵线”“伊斯兰国”等圣战萨拉菲主义团体的崛起,世俗派别更是彻底被边缘化,激进伊斯兰主义、圣战萨拉菲主义团体在反对派武装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少数族裔对反对派组织的信任和参与也消失殆尽。

(三) 亲政府群体动员机制与危机的教派化

叙利亚危机爆发之初,叙政府真实或潜在的支持者至少可分为两个群体:与现体制有密切利益绑定的精英群体及其网络,不仅包括少数族裔,也包括很多逊尼派群体;在现体制中既得利益有限、但对反对派主导下的新秩序存在不信任或恐惧心理的群体,包括绝大多数非混居地区的少数族裔成员。前一群体很大程度上迅速完成了自发动员,明确支持叙政府;后一群体的动员程度则相对不足,

^① Harout Akdedian, “Ethno-Religious Belonging in the Syrian Conflict,” p. 427; Ingrid Løland, “Between Utopia and Dystopia: Sectarianization Through Revolution and War in Syrian Refugee Narratives,” *Religions*, Vol. 10, No. 3, 2019, p. 16.

^② Rania Abouzeid, “The Jihad Next Door”.

^③ Christopher Phillips, *The Battle for Syria*, pp. 140-142.

起初并未明确表明立场。叙政府和支持叙政府的外部势力利用安全困境、群体内竞争的机制介入了两群体的动员活动,成功引导后一群体倒向亲政府立场。

根据其进程和内在机制,亲政府群体的动员过程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2011年3月至7月)亲政府群体迅速组织化,但民众自发和有政府介入的动员同时存在,教派威胁的话语在各少数教派群体中迅速占据主流。在组织层面,危机爆发之初,亲政府民众就开始自发地组建松散的街区自卫性组织“民众委员会”(Lijān Sha'biyyah),并强化与祖居地之间的联系。这一类组织在亲政府社群明显感受到反政府力量威胁的地区最早出现,如霍姆斯的阿拉维派街区。但几乎同期,叙政府已开始通过安全情报机构介入潜在亲政府群体的动员活动,一方面通过亲政府教会、部落、家族等传统盟友维持对地方社群网络的控制,另一方面则大力支持“民众委员会”的组建和扩散。“民众委员会”的功能也由维护社区治安、监督内部反对力量,转向应政府需要组织亲政府示威,乃至追捕、攻击反对派人士。^① 伴随亲政府团体对政府镇压活动的支持和参与,反对派对亲政府社区及相应教派的敌意和仇视也迅速升级,这一局面在教派混居的城市和农村地区迅速触发安全危机和暴力螺旋。最后,针对少数教派社群,叙政府还通过家庭、社区、教会等向持反政府立场的少数教派积极分子施压,同时通过亲政府团体压制温和派领袖在本教派内及作为教派间沟通渠道的影响力,统合少数教派社群的亲政府立场。^②

在话语层面,自危机爆发伊始,叙利亚民间尤其是少数教派社群中就散布各类带有教派对抗色彩的谣言,如一教派聚居街区计划向另一教派街区发动攻击,恐怖分子计划炸毁教堂,鼓吹“基督徒去贝鲁特,阿拉维派进坟墓”^③等等。无论其最初来源如何,此类谣言确实在各少数教派中制造了恐惧和愤怒情绪,与群体内动员相互配合加剧了少数教派所面临的安全困境。

第二阶段(2011年7月至2013年1月),在叙利亚危机军事化、伊斯兰主义武装团体在反对派中坐大、外部势力干预力度加大的背景下,亲政府群体、尤其

① Aron Lund, “Chasing Ghosts: The Shabiha Phenomenon,” in Michael Kerr and Craig Larkin, eds., *The Alawis of Syria: War, Faith and Politics in the Levant*, London: Hurst & Company, 2015, pp. 218–219.

② Paulo G. H. Pinto, “The Shattered Nation,” pp. 135–136; Friederike Stolleis, ed., *Playing the Sectarian Card*, pp. 46, 80–84.

③ [叙利亚]奈鲁兹·萨提克:《叙利亚起义中的教派主义状况:路径和模式》(阿拉伯文),第327、401页;Friederike Stolleis, ed., *Playing the Sectarian Card*, pp. 76–77, 84–87, 95; Ingrid Løland, “Between Utopia and Dystopia,” p. 16; Harout Akdedian, “Ethno-Religious Belonging in the Syrian Conflict,” p. 426.

是少数教派社群中原立场相对中立的民众对反对派的敌意和恐惧迅速加深,加速了组织化和军事化进程,最终构成本土亲政府民兵组织的主体。2011年7月以来,叙全国范围内教派暴力加剧,多次出现阿拉维派居民遭劫持暗杀且遗体受破坏的情况,甚至妇女儿童也成为袭击目标,阿拉维派武装分子也以残忍暴行回应。2012年5月的胡拉镇惨案则标志着此类教派暴力已带有大规模种族屠杀的色彩。更重要的是,叙政府一方面在官方媒体大肆报道针对少数教派的绑架、谋杀和其他残忍暴行,另一方面又默许亲政府民兵针对逊尼派采取的羞辱性行为,如强制迁徙、公开售卖从逊尼派街区劫掠而来的物品等。^① 教派暴力和相关宣传动员制造了强烈的愤怒、仇恨和复仇愿望,煽动报复和仇杀的教派主义话语甚嚣尘上,进而加剧了暴力螺旋的上升。至此,教派他者——无论是武装人员还是普通民众——整体上都已被妖魔化,世俗反对派的包容性话语也宣告破产。

在组织层面,随着暴力的不断升级,2012年起叙政府开始在伊朗政府和真主党的帮助下对已有的“民众委员会”和其他民兵组织进行重组,先是在2012年将其中最有效的团体组建为“人民军”(Jaysh al-Sha'bi),最终形态体现为2013年1月正式成立的“国防部队”(Quwat al-Difa' al-Watani)。与“民众委员会”相比,“国防部队”组织化程度更高,配备有重型武器,在每个省份拥有独立分支且与叙政府军保持着一定的协调。更重要的是,与地方自卫性质的“民众委员会”不同,“国防部队”团体越来越多地参与了全国范围的战斗。^② 考虑到其成员构成方面的地域和教派色彩,“国防部队”的成立也标志着很多带有少数教派色彩的亲政府民兵组织正式卷入了与反对派武装的军事冲突。

四、结语

阿萨德父子统治时期,教派因素在叙国内政治运转、经济、社会文化决策中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叙利亚危机爆发之前,教派间紧张关系整体受到压制、未得到充分动员,但各教派尤其是逊尼派与阿拉维派之间的利益分流、敌对情绪和民间组织网络,已为沿教派界限的动员铺平了道路。2011年叙利亚危机爆发伊

^① [叙利亚]奈鲁兹·萨提克:《叙利亚起义中的教派主义状况:路径和模式》(阿拉伯文),第405-408、412-414页;Friederike Stolleis, ed., *Playing the Sectarian Card*, p. 18.

^② Reinoud Leenders and Antonio Giustozzi, "Outsourcing State Violence: The National Defence Force, 'Stateness' and Regime Resilience in the Syrian War," *Mediterranean Politics*, Vol. 24, No. 2, 2019, pp. 8-10; Aron Lund, "Chasing Ghosts," pp. 219-220; Christopher Phillips, *The Battle for Syria*, p. 162.

始,民间自发的地方性教派动员和暴力已然出现。叙国内外精英通过不同的政策,迅速直接或间接介入民间自发性的教派动员,制造或强化了历史积累和新近出现的教派敌意、利益冲突、能力、机会意识等因素,触发并加剧了“安全困境/暴力螺旋”和“群体内—群体间交互作用”两大机制,最终导致教派主义的话语、组织原则在亲政府和反对派群体的动员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跨教派的、世俗性质的话语和组织原则逐渐被边缘化;伊斯兰主义、圣战萨拉菲主义倾向的逊尼派武装团体在反对派中占据主导地位,少数教派在反对派中参与微乎其微,绝大多数倒向支持政府的阵营,从而导致叙利亚危机的教派化。可见,教派主义的政策积弊及其对教派间关系的毒化作用,并非叙利亚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但却是叙利亚危机、冲突最终教派化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叙利亚政府对危机教派化的“阴谋论”解释以及反对派对叙利亚政府暴力的单方面指责,都有欠公允;双方关于内战前叙国内多元社群和谐共处的宣传或预设,也不尽符合事实。

通过对教派化机制的分析,本文可得出两方面具有政策意涵的推论。一是在叙利亚危机的解决和去教派化方面。鉴于安全困境/暴力螺旋是危机教派化、暴力化的核心机制,劝和止暴显然是任何危机管理和解决方案的先决条件;群体内—群体间机制倾向于推动冲突两阵营中温和派和极端派的此消彼长,因而“去教派化过程”应着力支持温和派对话、软化强硬派、压制极端派;考虑到外部变量对教派化动员的重要影响,外部势力妥协与合作也是实现危机解决和“去教派化”的重要前提。二是在战后重建方面。制度遗产和历史积弊是叙危机教派化的必要条件,因此要根治叙利亚的教派主义痼疾,就必须从制度角度彻底改造阿萨德政府的“双轨制”社会治理模式。此外,考虑到历史积怨和仇恨对于危机教派化、军事化过程中的重要影响,未来的战后重建工作不应仅仅聚焦于安全、政治、经济领域,还应重视社会重建与和解,尤其是对族际暴力苦涩遗产的清理。总之,对于经历过教派、族裔、部落暴力的中东国家而言,分治乃至分裂未必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共存”问题,保存现有的民族国家框架也并非奢望。鉴于此,包容平衡的制度设计、公开坦诚的社会和解、积极共识性的国族建构,才是通向后一目标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

(责任编辑:章远 责任校对:包澄章)